

6.07.5-2/41.2.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 术 讨 论 会



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斗争 及其经验教训

周文琪 张蔚萍

中共中央党校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1991年7月

内 容 提 要

本文着重阐述国际敌对势力的战略变化：“和平演变”为反和平演变的较量；我党在近十年来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反面教员启迪。

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斗争 及其经验教训

中央党校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周文琪 张蔚萍

一、国际敌对势力的战略变化

自从马克思主义破天荒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以来，在那些把资本主义当作永恒存在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眼里，马克思主义一直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死敌。当这一科学的学说在与国际工人运动结合下，冲破了对它的诅咒、攻击，终于在列宁的领导下于1917年11月（俄历10月）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使他们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感到了严重威胁。从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只是矛盾激化程度与斗争方式不同而已。

资本帝国主义对十月革命的刻骨仇恨，演化成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扼杀”战略。^①用当时丘吉尔的话说就是要把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但遭到了失败。后来，帝国主义又把希望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企图借希特勒之手达到扼杀或削弱共产主义的目的。经过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艰苦斗争，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超出了一国范围，相继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从那时起，帝国主义在前一阶段武装干涉失败以后不得不转换手法，不得不由武装“扼杀”战略转为“遏制”战略^②。所谓“遏制”，用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的话来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象一条河流，流到那里就会传到哪里，因此，必须把它堵住。为此，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周围组织了一系列军事集团，采取了军事上包围、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的方针，企图阻止“社会主义的扩大和蔓延”。当时，他们以军事遏制为主，在西欧建立了主要针对苏联和东欧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在亚洲搞了主要针对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和“中央条约组织”，还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然而，这些企图抵抗共产主义的屏障，并没有能阻止社会主义的发展。相反，他们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美军先后入侵朝鲜、越南，企图以占领朝、越为跳板“扼杀”中国的阴谋，连遭失败。不过，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是颇讲现实主义的，当“军事遏制”手段失灵以后，他们便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以收“不战而胜”的效果。

1952年8月27日，杜勒斯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首先提出要用一种新的“解放”政策来代替已被认为无效的“遏制”政策。而解放的方法必须用和平的手段，用政治战、心理

^①“扼杀”战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担任英国陆军大臣、后来接任首相的丘吉尔提出来的。

^②“遏制”战略是1947年7月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提出的。

战和宣传战的方法，先把东欧人心搞乱，然后支持东欧内部的反社会主义力量，“从内部进行破坏”。他还提出每年搞一次“被奴役国家周”，把东欧人民唤醒，去“争取人权”。这就是美国最早提出的和平演变思想。

由上可知，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敌视社会主义的现实政策与历史政策，虽然几经变化，却一脉相承。从过去的以军事“扼杀”、“遏制”战略为主，到今天的以“和平演变”战略为主，乃一付心肠，两付面孔而已。实际上是反革命两手的交替使用。

二、“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较量

西方一名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专家认为，美国四十年来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有两个高潮。一个是五十年代中期发生的事件，震撼了社会主义阵营。他说的“事件”主要是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事件，在波兰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发生的“纳吉事件”以及中国发生的右派向党进攻事件。另一个（“高潮”）是“最近十年发生的事件，动摇了共产主义世界。”他主要是指在东欧发生的演变，苏联发生的动荡，在中国发生的自由化思潮和北京动乱。

五十年代中期，相继发生的上述“事件”，曾经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警惕。当毛泽东在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看到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之后，当时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58年11月30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他的讲话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毛泽东并要求省委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1959年11月，在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印发了杜勒斯讲和平演变的几篇演说，要大家看。他说：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说，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这里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四十多年前当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崩溃，美国当权者准备扶植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走“第三条道路”的时候，毛泽东就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战争》等重要文章，集中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擦亮了人们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而当五十年代，杜勒斯第一个提出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这一战略思想，并把希望再次寄托在“民主个人主义者”特别是党内“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的时候，又是毛泽东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并抓住这个问题。他在六十年代特别讲到，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社会基础的。他反复提到我们的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败变质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毛泽东指出：“在我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沒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①这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

不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六十年代中期，杜勒斯虽然想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3页。

演变，但他并没有信心，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他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身上。这个时期，两种制度的斗争主要以军事对峙形式出现，双方剑拔弩张，没有往来，难以实现和平演变。和平演变只处于刚刚提出、酝酿和试探推行阶段。

然而，进入七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两种制度的斗争逐步过渡到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为主要形式。其背景和原因是：

第一，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党政领导后，美苏关系开始全面缓和。与七十年代相比有明显不同，那时的缓和是美国出于越南战争后战略上收缩的需要，是出于军事、外交的需要；而这次的缓和是美国从苏联、东欧的变化中，看到是历史性的机会，可以用缓和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攻势以推行其“和平演变”的战略。尼克松认为对苏联、东欧“和平演变”的首要条件是“寻求缓和美苏关系”。那么，既然美国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什么又要强化推行以推翻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和平演变”呢？从现象看，这两者似乎是矛盾的，然而，从美国反共势力来说，“缓和合作”与“和平演变”不仅不相悖，而且是完全协调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通过东西方之间的“缓和合作”，西方才能插手，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和平演变”进程；而战争、冷战与封锁，把两个世界隔开，则是难于实现这一目的的。对此，尼克松以至美国政府并不讳言。

第二，八十年代初以来，整个西方世界都由经济危机转入复苏，科技突飞猛进。这就为国际垄断资本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们不仅以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来标榜和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此“稳定本国民心”、“征服共产主义世界的人心。”而且凭借其经济优势，能够拿出巨额美元收买共产主义的叛徒、民族败类以及其他动摇分子、投机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者；还可以拿出巨额经费加强新闻、出版和文化教育部门，开展舆论宣传和“攻心战”。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遇到了严重困难和挫折，各国普遍掀起改革开放浪潮。他们认为利用共产党面临的困难和改革开放，逐步把社会主义各国诱导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推行和平演变千载难逢的良机”。另外，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都相继去世，共产党国家今后很长时间要实现新老交替，这“必然导致内部的权力之争和政治分歧”这是从内部寻找合适的“代理人”和“发展民主势力的好时机”。

第四，东欧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泛滥，政局发生急剧变化，使美国 and 西方国家受到很大鼓舞，他们情不自禁地说：“自由的光芒已照亮了东欧大地”，“苏联城乡已刮起一股新风”，今天的“民主、自由的浪潮已从华沙席卷天安门”，“在一个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共产主义最终将会崩溃”。①

正是在上述背景和原因下，促使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继续保持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军事遏制实力的基础上，开始侧重使用综合手段，即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手段为主，从东西两面开弓，向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这就是东欧、苏联与中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演变、动荡和政治动乱的大背景。

这个时期，他们搞和平演变跟过去相比有许多新的特征。其策略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阴险毒辣：第一，“和平演变”与“军事遏制”交替使用，以“和平演变”为主；第二，

①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

“打”和“拉”相结合，以拉为主，如拉不动，则以政治威胁、经济制裁，直至采取搞颠覆活动以至武装干涉；第三，思想渗透与物质引诱相结合，基本上以思想渗透为主；第四，政治影响与经济援助相结合，经济援助为实现政治目标服务；第五，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相结合，一般以合法为主，但秘密活动从未停止过。他们的国际战略专家认为，这几个结合今后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一个时期以哪种手段为主，应根据形势变化和美国的利益须要灵活运用。总之，其策略手段是为其战略目标服务的，而且在运用这些策略时，他们的配合更协调、行为更一致。布什强调：当前西方各国“头等任务是制定一条协调一致的政策”。

三、我党在近十年来反“和平演变”的斗争

中国，这个屹立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从五十年代杜勒斯开始提出“和平演变”战略起，就被看成是“共产主义的顽固堡垒”，“西方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险”。几十年来这一看法迄未改变。因此，在对东欧、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忘记对中国搞和平演变、搞颠覆活动。

早在七十年代末，我党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美国和西方就开始注意并企图从中寻找其所依靠的力量。当时，他们在社会上特别关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和上海的“民主讨论会”。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公开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并向美国和港台机关提供情报，其代表人物就是那个臭名远扬的魏京生。与此同时，党内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也出现了个别利用纠正“文革”错误而鼓吹西方民主、自由，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人物。美国政界要人看到这种情况真是欣喜万分，认为中国大陆并不是“铁板一块”，确有“和平演变”的可靠力量。当我党对这种右的思潮给予批评并对魏京生等人严厉打击以后，美国一些政界要人和官员竟公开干涉我国内政。他们多次以“人权”为口号，要求释放魏京生等人。这就是近十年间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最初较量。

进入八十年代，美国以及港、台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势和思想渗透，鼓励和引诱党内外自由化分子利用舆论阵地传播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哲学、社会学说和文艺作品，散布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动摇人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瓦解人们的精神支柱。针对这种情况，我党不仅讨论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且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战略方针，同时决定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这些措施击中了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关键，于是他们就动员一切力量攻击清除污染的决定。1984年3月，美国研究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问题专家伦敦夫人公开发表演讲诬蔑说：“清除精神污染是极权统治三十年，摧残人性、强调阶级性的必然产物。”国内的自由化分子一唱一和，也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清除污染。这场斗争，可以说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又一次较量。由于党内某些主要领导人指导思想的右倾，这场斗争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1985—1987年初，美国和港台在继续加强对中国搞思想渗透的同时，强调要利用我党搞体制改革之机加强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方励之等为代表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代表人物，同西方敌对势力相呼应，公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说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是“封建集权政治体制”，“不如美国和西方的政治体制民主”，提出“要民主，要自由”，并到处发表文章和演讲，说“民主和自由不是上边恩赐的，而是斗争得来的”，鼓动学生闹事。于是，在1986年冬至1987年初，上海、南京、合肥、北京、天津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学生闹事的重大事件。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明确提出：“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①同时还指出，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鼓动学生闹事的代表人物，要严明党纪进行处理。党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开除了方励之等人的党籍，很快制止了学潮。这场斗争是新时期“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又一个回合的斗争。

1987—1989年，美国政界要人和国际战略专家们进一步研究了中国的政局和发展战略，认为中共平息这次学潮后仍然要继续加快改革的步伐，今后应着重利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集中主要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做文章。1987年10月，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季刊》发表《共产主义的危机：公民参政的矛盾》一文，谈每个执政的共产党必须解决“公民参政”的问题。说中国的主要困境是，经济改革将会带来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对“党的领导作用提出挑战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他诬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执政党被整个社会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共产党是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的“一种致命缺点”；说人们提出“真正参政”（指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预示着“实行社会动员和禁止参政的共产主义制度消亡的时刻即将到来。”美国的舆论宣传还鼓吹要鼓励中国推行市场经济，通过搞市场经济逐步恢复私有经济，这是“实现工业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他们还提出，应鼓励中国的“革新派”名人团结起来，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力量，以推动中共领导层的“革新派”人物大胆行动。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国内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在美国、香港、台湾和中国许多报刊发表文章和演讲，明目张胆地攻击四项基本原则，公开叫嚷要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面对这些情况，当时身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反而或明或暗地加以纵容和支持。国际敌对势力看到这种形势，很受鼓舞。

在改革不断深入，而国内外有些人企图把它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时刻，我党于1988年8月及时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得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却引起了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自由化分子的不满。赵紫阳同志口头上同意“治理整顿”，实际上并不赞成。于是在9月19日，党的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急忙会见了美国总统顾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想籍外国人的支持来压中央。弗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须吸收三条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自由私营的市场”，其次是“人们必须自由流动”、“资金必须能够自由流动”。赵很欣赏弗的这些见解。据弗回美后的回忆说“赵明确表示，若一个领导人不能被充分授权的话，就无法推动经济改革。”

于是，十三届三中全会后，国内自由化分子与香港某些反动势力联合刮起“倒邓保赵”风。赵的智囊团也纷纷发表有关言论。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越来越露骨，政治活动也愈益频繁，气势愈来愈嚣张。一直发展到春夏之交，挑起学潮并酿成动乱和暴乱。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正确而果断的措施，一举平息暴乱。这是近十年来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

^①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

变最严重的一次斗争，是关系到我国、我党生死存亡的一场血与火的斗争。

四、反面教员启迪

当我们付出了血与火的昂贵代价，取得了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之后，我们不能不从反面教员给我们这种直接的、现实的教育中认真地汲取经验教训。

西方搞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反动本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和平演变的关键是通过外部手段来诱发和催化内因，使其起主要作用。就我国内部来说，的确还存在着“和平演变”的内在因素。

首先，如毛泽东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西方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社会基础的。这从1989年发生的北京动乱更加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渠道，在我国国内物色、培植他们的代言人、代理人。适应国际反动势力的这种需要，极少数混迹于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意志薄弱者、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腐败分子，以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为基础，逐渐汇集成为一股反动政治势力。他们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幌子下，大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舆论，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我们党内有一些人，还有个别处于高级领导岗位的同志，竟然纵容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纵容官倒、腐败等现象，终于导致动乱和暴乱事件的发生。

第二，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还相对很低。这是因为我国原来的经济落后，起点很低，社会主义制度又是脱胎于旧社会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探索、完善过程，才能充分显示其优越性。如果不能科学地、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就会在西方物质文明的诱惑下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产生怀疑，为“和平演变”政策所俘虏。

第三，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如果政策不对头，工作有失误，就会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利用，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第四，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存在具有两面性，其消极作用表现在，作为商品生产的私有者，向往私有制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内反映这种利益要求的代言人，就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

第五，旧社会遗留的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思想观点继续存在。

第六，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比如，国际敌对势力利用“黄、赌、毒”推行其和平演变阴谋。随着改革开放，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瘟疫，通过各种黑道传播，严重地冲击和危害着我们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第七，执政的共产党的部分成员也存在着蜕变的危险。

针对上述情况，根本问题是搞好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加强反对“和平演变”战略的斗争呢？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很重视向反面教员讨教的。“和平演变”战略同样给了我们极其重要的启示，那就是把其中的“演”字改成“防”字，就可作为我们的战略，即“和平防变”战略。

“和平防变”战略的核心是对外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对内防止党和国家性质的演变。对外，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都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广交朋友，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为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对内，鉴于西方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的关键是从内部寻找代理人和反对势力，从内部来瓦解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所以我们必须在内因方面积极防范和杜绝发生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把党自身建设好，国内工作做好，经济上去了，政治更加稳定，西方搞和平演变就失去了土壤和条件。因此，“和平防变”战略具有积极的防御性和建设性的特点。

“和平防变”战略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要使全党全民充分认识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历史意义，长期不懈地进行和平防变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必然性、长期性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矛盾斗争的时代特征决定的。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那么，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便会必然地、长期地继续下去。第二，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抵制和反对国际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这是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思想保证。第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专心致志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这是“和平防变”的可靠物质保证。第四，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特别是要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使其成为粉碎和平演变阴谋捍卫国家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柱石。这是“和平防变”的重大政治措施。第五，聚精会神地加强党的建设，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的接班人：在当前，要认真解决腐败、官倒等人民普遍不满的问题，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党的威信和战斗力，这是“和平防变”的根本问题。

过去，我们党在反和平演变斗争中，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一度把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犯过扩大化的错误；近十年来，由于阶级斗争观念淡化，又一度忽视了反和平演变斗争，甚至把它当成“左”的倾向加以批判。实践证明，这两种倾向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吸取以往的历史教训，正确地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这里关键是科学的分析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实事求是地估计它在党内的反映。既要继续克服右的倾向，又要防止“左”的倾向滋长，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当前主要还是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带来的危害，充分认识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人说，反和平演变已经讲得太多了，似乎又要回到“左”的路上去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美国宣讲和平演变，可以说是四十年从未间断过，特别是近十年来，他们从国务卿到总统，从专家学者到大资本家，不仅大讲特讲，还著书立说，而且投资亿万美元，大搞思想政治渗透和阴谋颠覆活动，其和平演变战略已经在某些国家“得逞”或“已见成效”；而我们是在1989年平息暴乱，邓小平提出国际大气候之后，才开始重视和平演变的问题，这怎么能说是讲多了，搞“左”了呢？这显然是一种糊涂观念。